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耶穌、詩人與詩：對民國時期 (1912-1949) 基督徒創作的考察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ANG, Zhixi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6 11:00:1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30

耶稣、诗人与诗： 对民国时期(1912—1949)基督徒创作的考察

王志希

内容提要:耶稣、诗人与诗,这三者有什么样的关系?从民国基督教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耶稣在一些民国基督徒的笔下成为一位诗人,即“诗人耶稣”;另一方面,民国基督徒也以诗歌的形式,塑造出他们眼中的耶稣形象,即“诗中耶稣”。而无论是“诗人耶稣”,还是“诗中耶稣”,都既涉及民国基督徒对福音书文本的诠释和使用,又与他们所处的思想氛围、宗教—文化处境以及社会—政治处境紧密相关。民国基督徒笔下的“诗人耶稣”,主要延续了18世纪末以降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想氛围,而民国基督徒笔下的“诗中耶稣”,则在延续西方传统的同时,拥有更多本色化或处境化的特质。

关键词:耶稣;诗人;圣诞诗;民国

Jesus, the Poet & Poems:
Focusing on Christian Writings in Republican China

WANG Zhixi

Abstract: How does Jesus relate to the poet as well as

poems? From a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on the one hand, Jesus becomes a poet (or the Poet) in the eyes of some Republican Christians.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Christians begin to shape their images of Jesus in the form of poetry. And both aspects involve not only the interpretation and use of Gospel texts, but also the intellectual ethos, religio-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at that time. In short, “Jesus the Poet” in Republican China is just similar to the Jesus constructed by Western Romanticism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while “Jesus in poems” written by Republican Christians is more indigenized and contextualized, albeit still with some characteristics from Western Christian traditions.

Key words: Jesus; poet/the Poet; Christmas Poems; Republican China

他有完全的诗人风度,他的表现法完全是诗的表现法,他的观察、判断、行动、言论……都是诗人风范。所以我们若要认识整个的耶稣,便非认识这个诗人耶稣不可。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1940)^①

耶稣啊!

今年圣诞节起,愿

你降临,用赐恩的手救我中华。

——吴破我:《庆祝耶稣降生在中华》(1947)^②

①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再版,1940年初版),第1—2页。

② 吴破我:“庆祝耶稣降生在中华”,载《天风》,总第102期,1947年12月,第11页。

耶稣、诗人与诗这三者有何关系？一方面，从公元1世纪开始，耶稣形象就进入初代基督徒的笔下，成为诗的一部分。洛佩琪（Peggy Rosenthal）指出，《新约》的《腓立比书》2：6-11即是使徒保罗关于耶稣的诗。其中描绘了“降卑”又“升高”的耶稣形象：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以至于最终“死在十字架上”；而“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全诗以“耶稣基督为主”作结尾。^①这一首关乎耶稣降生、死亡、复活与高升的诗歌，其内容在以后的不同世纪中，不断地在基督徒诗人的笔下流传——尽管在不同时代亦呈现不同的特质。

另一方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在西方兴起。这一注重个人的情感、想象力以及回归大自然的运动，也影响到对耶稣形象的塑造。耶稣不仅是诗的内容（“诗中耶稣”，Jesus in Poems），他自己更成为诗人本身（“诗人耶稣”，Jesus the Poet）。例如，在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看来，耶稣是“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Romantic poet-genius）。^②从西方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思想史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干脆称浪漫主义时代的耶稣是“属灵的诗人”（The Poet of the Spirit）。^③

当耶稣来到中国时，他的形象也出现在皈依基督宗教的中国诗人的笔下，例如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士大夫张星曜（1632—？）以及著名画家、诗人与耶稣会神父吴历（1632—1718）。而19世纪新教人华之后，中国新教徒也渐渐增多；到民国时期，尤其是1920年代开始，“有一部分受过神学教育的中国信徒，已经渐渐取代了西方

① Peggy Rosenthal, *The Poets' Jesus: Representations at the End of a Millenn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② Peggy Rosenthal, *The Poets' Jesus: Representations at the End of a Millenn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1.

③ 帕利坎：《历代耶稣形象》，杨德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41—255页。亦参见 Jaroslav Pelikan, *Jesus through the Centuries: Hi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4—205.

传教士的地位,成为中国基督教的代言人。他们能够以中国人身份,把握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去阐释基督教信仰,同时他们也能够以中国信徒身份,去为当时中国教会面对的问题提供意见。”^①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在民国时期(1912—1949)基督徒著述中,耶稣、诗人与诗的关系。研究的问题是:耶稣、诗人与诗这三者的关系在民国基督徒的著述中,如何既延续西方特质,又产生本色化或处境化^②的特质?本文使用的原始资料主要是民国时期

① 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1页。

② “处境化”与“本色化”这两个概念在学术界有狭义与广义之争,概括而言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有的学者对“本色化”一词持广义的界定,认为“本色化”这一概念在20世纪前期可以同时包括狭义的“处境化”与狭义的“本色化”的意涵。例见邢福增:“本色化与民国基督教教会史研究”,载氏著:《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集》,台北:基督教学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第264—269页。

第二,还有文献对“处境化”一词持广义的界定,认为“处境化”是“针对第三世界实况的特殊性”,它并未忽视狭义的“本色化”努力使基督教适应传统文化,但是同时又重视基督教回应变动的时代处境。参见古爱华:《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邓肇明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页,注29。

第三,有的学者对两个概念皆作狭义界定,并且区分二者,认为“本色化”多聚焦在静态的“文化”层面(基督教如何植根于本土文化中),而“处境化”则更关注动态的“社会与政治”层面(基督教如何回应当前的时代处境)。笔者在本文中持此观点。

必须说明的是,谈到语词的概念问题,笔者不同意本质主义范式的“语言图像理论”,即那种认为可以找到概念的本质定义的看法;相反,笔者认同后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理论”,即概念或语词只具有功能性而不具有本质性。换言之,概念或语词的意义不决定于它自身,而决定于对它的使用——所谓“用法决定意义”(meaning as use);须理解到“语言的结构和功用,只能在它嵌入说话者的活生生的生活时被就地揭示出来”。参见M·麦金:《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研究〉》,李国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页。因此,以上三种关于“本色化”与“处境化”的界定,不能说哪一种是最正确的,而只能说我们如何“使用”这两个概念,决定了它们的意义是什么。

的报章杂志及相关专著。全文分为两大部分，首先谈论民国基督徒的“诗人耶稣”（作为诗人的耶稣形象），其次讨论民国基督徒的“诗中耶稣”（诗歌中所塑造的耶稣形象）。

一、民国基督徒的诗人耶稣

就笔者所知，民国时期至少有两位基督徒塑造了“诗人耶稣”的形象，一是单伦理，二是朱维之。首先，爱好艺术的基督徒教师单伦理塑造了“诗人耶稣”，见于他的文章《耶稣的艺术观》（1928）中。在那篇文章中，单伦理将耶稣视为“艺术家”。他指出，耶稣在四福音书中宣告“天国”，而通往天国的路，应是一条“宗教的泥和艺术的水所筑成的大路”^①。如何证明耶稣“爱艺术”呢？“纯洁”和“美”是艺术的要求，而耶稣对这两点的要求可以从三段福音书文本中体现出来：其一是《约翰福音》2：13-16中耶稣用鞭子洁净圣殿，乃是因为“纯洁的上帝的殿污秽了”；其二是《马太福音》22：11-12中耶稣将天国比喻为国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国王看到“赴庄重婚筵的来宾不穿礼服，他主张不许入座”；其三是《马太福音》9：13-14中耶稣责备门徒拦阻小孩子去见他时，强调在天国里的正是如小孩子一样的人，这不仅仅因为孩子谦卑和良善，更重要的“是因为儿童是清心的是爱美的，并且儿童对于审美观念特别浓厚的原故”^②。

更具体而言，耶稣也是一位诗人。单伦理征引《马可福音》14：26，指出耶稣与门徒在最后晚餐之后唱诗，表明耶稣“时常吟颂”诗歌。^③不仅如此，耶稣还创作诗歌：

-
- ① 单伦理：“耶稣的艺术观”，载《真光杂志》，第27卷第10期，1928年，第21页。
 - ② 同上，第22页。
 - ③ 不过，文本本身并无法证明耶稣吟颂诗歌是否算是“时常”。因为《马可福音》14：26只是说：“他们唱了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我们且读读他在情感冲动时顺着自然所作的诗歌：“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①

尽管一般都将上述出现于《路加福音》10:21-22中的话视为耶稣向上帝的祈祷，但是单伦理颇具创意地认为这是耶稣自然吐露的诗歌，并且希望藉此证明耶稣的确是一个诗人。

比起单伦理，朱维之所塑造的“诗人耶稣”更为鲜明，且论证更为细致。他的《基督教与文学》最初写于二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在该书中，朱维之开宗明义，引诗人布莱克的话（与学者洛佩琪相似），认为耶稣是“创造天才的化身，或诗的化身”^②。朱维之究竟如何论证“诗人耶稣”这个形象的正当性呢？笔者认为，他在两个方面的论证最值得注意。

其一，朱维之从耶稣的血统和家教上论证。无论是《马太福音》1:1记载的耶稣家谱、《马可福音》10:46-52记载的瞎子巴底买称呼耶稣为“大卫的子孙”，还是《马太福音》21:15中小孩子在圣殿中向耶稣呼喊“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三处福音书文本都证明耶稣拥有“诗人”的血统；因为耶稣是“希伯来最大的诗人大卫的子孙，是抒情诗和哲理诗名作家所罗门的子孙”。而且在《路加福音》1:46-56中耶稣母亲马利亚吟唱了“尊主颂”，也证明“诗人耶稣的胎教也是富于诗的理想”^③。

其二，朱维之从耶稣幼年所处的自然环境论证。事实上，四

① 单伦理：“耶稣的艺术观”，载《真光杂志》，第27卷第10期，1928年，第22页。

②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再版），导言。

③ 同上，第2页。

福音书并无太多关于耶稣幼年所处自然环境的记载，因此朱维之只好另辟蹊径，首先引用一本富于想象力的“耶稣传记”，即卢特维喜(Emile Ludwig)的《人之子》。该书第一章想象耶稣小时候如何躺在“山边草地上”，周围是“蓝田”、“朝阳”、“云”、“风”和“海”。这一切在福音书正典中当然找不到出处。不过，在此颇具想象力的引述之后，朱维之开始征引福音书中耶稣与大自然发生关联的文本，从青年耶稣反过来论证幼年耶稣所受自然风景的熏陶，如青年耶稣“欣赏野地里的百合花的真美”，“羡慕天空的雀鸟，来去无牵挂”；他“常在高山上、或在斜坡下、或在湖水边、或在野地中，向群众说教”，而且虽然“有时在城市中、会堂里教训人，但每到身体疲乏，灵感枯竭时，便赶紧离开那熙攘的环境，好像逃走一般地独自到‘空山不见人’的地方，去祈祷冥想”。^①

事实上，朱维之这种将“大自然”与耶稣紧密联系起来以塑造“诗人耶稣”的做法，延续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传统。因为，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一种回返“大自然”的冲动。若借用洛佩琪的比喻来说，如果浪漫主义诗歌是一个“舞台”，则耶稣就与“大自然”一起处于那个“舞台”的中心，共同演出戏剧。^②在笔者看来，朱维之受浪漫主义影响这一论点，也从他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多次引用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或作家——诸如前引的布莱克，以及19世纪著名的《耶稣传》作者勒南(E. Renan)和19世纪中期女诗人洛赛蒂(Christina Rossetti)^③——得到证明。

无论如何，“诗人耶稣”的形象在单伦理和朱维之笔下清晰可见。耶稣有伟大犹太诗人(大卫和所罗门)为其祖先，受过良好的“诗性”(poetic)胎教，从小就与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的“大自然”打

①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再版），第2页。

② Peggy Rosenthal, *The Poets' Jesus: Representations at the End of a Millenn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5.

③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再版），第1、8、9页。

成一片(朱维之);因此长大后不仅仍与大自然感情深厚,而且热爱艺术的“纯洁”与“美”,时常吟唱和创作诗歌(单伦理)。这便是—些民国基督徒为读者呈现的“诗人耶稣”,而这个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西方人的想象,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所塑造的作为“浪漫主义英雄”的耶稣(Jesus as the Romantic hero)。①

二、民国基督徒的诗中耶稣——以圣诞诗为例

如果说民国基督徒笔下的“诗人耶稣”主要延续了西方的(浪漫主义)特质;那么他们的“诗中耶稣”则在延续的同时,亦有更多本色化或处境化之处。按笔者有限的阅读,民国基督徒关于耶稣的诗中,数量最多的主题涉及他的诞生;当然,此外也有对其生平、受难与复活的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讨论耶稣诞生的诗歌(即圣诞诗)为例。

就形式而言,这些圣诞诗呈现为中国传统的七言诗或现代诗。就内容而论,《马太福音》第1—2章和《路加福音》第1—2章对耶稣诞生各个场景的描述,均有民国基督徒运用于诗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片段有:《马太福音》中的东方博士朝拜、耶稣一家逃往埃及与希律屠杀婴儿,以及《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于马棚、天使报喜讯与牧羊人闻喜讯。本章首先扼要讨论那些诗的前文本(pretext)结构,即不同的福音书片段被如何编排进诗歌中;再按民国基督徒在诗中呈现耶稣诞生的不同意涵(implication)进行分析。

① Peggy Rosenthal, *The Poets' Jesus: Representations at the End of a Millenn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8. 林荣洪指出,1940年4月赵紫宸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演讲,该演讲后来陆续刊登在《金陵神学志》上;在那些演讲中,也有“诗人耶稣”的课题。参见林荣洪:《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4年,第222—223页。限于篇幅本文暂时无法处理,留待将来分析。

（一）圣诞诗的结构

首先议论圣诞诗的前文本结构。就笔者所见，除了一些民国基督徒概括性地叙述耶稣诞生之外，圣诞诗中最常见的是以《路加福音》的耶稣诞生为前文本，而少见单独以《马太福音》的片段为前文本。最值得留意的，当属民国基督徒如何在诗中重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片段，交织架构出耶稣诞生的叙事。

例如，清民的《读耶稣传杂咏》（1915）、严霁青的《耶稣奇迹二十首》（1926）、述先的《耶稣生日歌》（1940）、黄淑芬的《佳音》（1940）均先描述天使报佳音给牧羊人（路2：8以下），然后笔峰一转，继续描述东方博士朝拜耶稣，如此将二者融为一炉。^①其中，《耶稣奇迹二十首》写道：“牧人半夜睹荣光，知产郇城一圣王……东方博士按星临，争问槽头拜圣婴。”更有趣的是，该诗混合了《路加福音》的“槽头”与《马太福音》的“东方博士”——但事实上，仅见于《马太福音》中的“东方博士”朝拜耶稣之地是“房子”（太2：11），而非仅见于《路加福音》的“马槽”（路2：7, 12, 16）。可见，当时的中国基督徒仍然延续基督教的传统论述，将不同福音书的文本混为一谈，而并不考虑相关片段的不同出处。

（二）圣诞诗的意涵

其次考察耶稣诞生的不同意涵。就此而言，本文分别从（1）

① “牧儿此日何侥幸，随拜浑如九品神……信主无如三国王，望星命驾觐荣光。”参见清民：“读耶稣传杂咏”，载《善导报》，第34期，1915年，第382页。“牧人半夜睹荣光，知产郇城一圣王……东方博士按星临，争问槽头拜圣婴。”参见严霁青：“耶稣奇迹二十首”，载《真光杂志》，第25卷第12期，1926年，第72页。“使报告，牧人亲见。谓有基督，道成肉身；大喜信息，关乎万民。博士来朝，金香奉献……”参见述先：“耶稣生日歌”，载《真光杂志》，第39卷第12期，1940年，第18页。“听天使报佳音，看牧羊人惊醒；景星引领东方博士，同来朝拜圣婴。”参见黄淑芬：“佳音”，载《真光杂志》，第39卷第12期，1940年，第19页。

基督教本身的处境,(2)中国的宗教—文化处境,以及(3)中国的社会—政治处境这三点分析。

第一,从基督教本身的处境(Christian context)看,一方面,有部分民国基督徒的圣诞诗对东方博士朝拜耶稣的典故进行“转义”(trope),比喻东方博士对耶稣的爱。例如,徐宇强的《相见欢(博士远来朝圣婴)》(1939)写道,东方博士:

不远千里而来,/紧跟随,/天上明星寻见真宰。/路虽长,/苦虽多,/气不馁,/爱主的心可敬又可佩。^①

诗人为《马太福音》对东方博士朝见圣婴的记述添加了许多想象,如称他们千辛万苦来见耶稣,表明“爱主之心”何其深。由此得出的教导则是,如今的基督徒也应以那些博士为典范,效法他们的榜样,不怕“路长”、“苦多”地来爱耶稣。与此相似,清民的《读耶稣传杂咏》也表明朝拜耶稣是“贵幸钦崇一热肠”;但特别的是,他笔下来朝拜耶稣的人不是“博士”,而是“三国王”：“信主无如三国王,望星命驾觐荣光。”^②三国之君皆来见婴孩耶稣,如此更加呈现诗中耶稣不仅受“博士”所敬重,更比“国王”尊贵。这给了时人具体的意象,即基督教所信仰的耶稣究竟地位如何(高于“国王”)。

另一方面,也有圣诞诗围绕着耶稣诞生乃是为人“赎罪”、引人“重生”进行创作。例如,纪重生的诗《耶稣救主(苏武调)》(1932)在引天使报佳音之后,描写耶稣诞生是“替世人,赎罪愆”;并且在诗的最后,诗人从人如何回应这位“赎罪愆”的耶稣之角度,再次强调:“令人速悔改,甘作赎罪祭,只要相信不论中外老幼

^① 徐宇强:“相见欢(博士远来朝圣婴)”,载《真光杂志》,第38卷第12期,1939年,第53页。

^② 清民:“读耶稣传杂咏”,载《善导报》,第34期,1915年,第382页。

女与男。”^①同样地，杨宇清的《耶稣圣诞诗一则》（1915）描述牧人听闻耶稣降临于大卫城之后，紧接一句诗人自己的论述，强调从今以后世人有“重生”之路：“万众从今沾厚恩，重生有路乐欢心。”^②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到，诗中耶稣的形象，与他诞生之后的工作（the work of Jesus）——包括赎世人罪、使人重生——密切相关。

第二，从中国的宗教—文化处境（religio-cultural context）而言，可以看到，民国基督徒在圣诞诗中会用中国宗教文化气息浓厚的话语来描述耶稣诞生，包括“祥云”、“天神”（即天使）^③和“乾坤”等。以“乾坤”为例，理真孟庸的诗《上帝遣爱子耶稣救人》写道：“造化乾坤真活神，差遣救主降凡尘。”^④“乾坤”原本为儒家五经中之《易经》的“干卦”与“坤卦”，指称“天地”。诗人在此用该词将耶稣嵌入中国宗教—文化的话语中，表明差遣耶稣降世为人的是“造化乾坤”的主宰，以图凸显耶稣对于中国人的适切性。更有趣的是，另外两首以耶稣为主题的诗在描写耶稣的复活与升天时，也同样用到“乾坤”一词。^⑤诗人借用中国宗教—文化处境中的话语，描述耶稣诞生，这一点显然是将西方传入的圣诞论述作出本色化的调适。

第三，就中国的社会—政治处境（socio-political context）分析，民国基督徒的“诗中耶稣”还呈现出处境化的调适。一方面，

-
- ① 纪重生：“耶稣救主（苏武调）”，载《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1496期，1932年，第4页。
 - ② 杨宇清：“耶稣圣诞诗一则”，载《新民报》，第2卷第3期，1915年，第43页。
 - ③ 磐石：“耶稣圣诞咏”，载《善导报》，第22期，1915年，第50页。
 - ④ 理真孟庸：“上帝遣爱子耶稣救人”，载《真光杂志》，第40卷第8—9期，1941年，第52页。
 - ⑤ “遥知天国升高座，万古乾坤一掌擎。”参见清民：“读耶稣传杂咏”，载《善导报》，第34期，1915年，第383页。“神死乃足转乾坤，至今万物赖生存。”参见严霁青：“耶稣复活节歌”，载《真光杂志》，第39卷第3期，1940年，第57页。

有些圣诞诗从耶稣降生的地点与环境落笔,论述这一事件如何颠覆了俗世之人的价值观念,如磐石的《耶稣圣诞咏》(1915)写道:

异星如日夜昭昭, / 百万天神涌似潮。 / 世界大千齐拍手, / 共欣救主降今宵。 / 栈作王宫槽作床, / 甘贫救世我维皇。 / 功名富贵浮云视, / 万岁千秋永福长。^①

诗人描绘的圣诞场面恢宏,耶稣如世间皇帝之子诞生一般,有天上星象预兆,还百万天使庆贺。但尽管如此,诗人却笔峰一转,将这个宏大画面与另一个看似不协调的场景联系在一起:耶稣诞生虽与世间皇子一样,有诸种预兆也极尽热闹之能事,但耶稣的特别之处却在于他的“王宫”是一个客栈,而他的“床”则是一个马槽。简陋的客栈和马槽,与热闹的场景和耶稣的身份形成强烈反差。在这一反差背后,诗人想要传递的意涵是:耶稣原本享有一切,他却为了拯救世界而放弃,反而选择了贫穷的诞生。既然耶稣视“功名富贵”如“浮云”,他就必定能被民国时期贫苦且无地位和权力的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而且,诗中耶稣的诞生也再一次提醒基督徒,要效仿耶稣的“甘贫”,不追求“功名富贵”——这就是诗中圣诞节与耶稣所示的形象与意涵。^②

另一方面,在1945—1949年间,吴破我在《天风》上先后刊载两篇圣诞诗,分别题为《庆祝耶稣降生在中华》(1947)与《愿耶稣生在我们当中》(1949),二者都根据民国的社会—政治处境,将耶

① 磐石:“耶稣圣诞咏”,载《善导报》,第22期,1915年,第50页。

② 清民的《读耶稣传杂咏》也呈现出相似意象,例如该诗中的两句:“何故不生尊富室,贬人傲乐与贪财”,以及“主降原为普救人,偏于贫贱更相亲”。参见清民:“读耶稣传杂咏”,载《善导报》,第34期,1915年,第382页。

耶稣的诞生置于其中，以求凸显耶稣之救“中华”（前一首），或重塑“中华教会”（后一首）。《庆祝耶稣降生在中华》一诗表达了诗人对民国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在他看来中国本应“古色古香”，却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穷”、“弱”、“愚”、“乱”。所以诗人祈求耶稣：“今年圣诞节起，愿你降临，用赐恩的手救我中华。”该诗与前文讨论过的诗有所不同，在于它借用了《马太福音》2：16—17中的典故，即希律王因自己被东方博士愚弄而下令杀死伯利恒城及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其特别之处在于将该段经文应用于当时的中国：

包藏祸心的希律王再世，/把广大中原国当作伯利恒，/把
无辜婴孩似的平民，/把纯洁婴孩般的青年，/偷了去，绑了
去，/打了监了，/铁般的禁锢，/疯狂的屠杀。^①

因此，诗人再次祈求道：“耶稣啊！今年圣诞节起，愿你降临用真理的自由赐我中华。”^②从诗中可以看到，圣诞叙事中的希律王杀婴以处境化方式融入诗人论述中，使诗中耶稣的诞生因此带有了民国社会—政治处境的意涵，成为民国诗人“医治”那个时代之问题的“药方”。

至于《愿耶稣生在我们当中》一诗，其结构与前一首相似，诗人首先回顾身处的社会—政治处境，随后祈求耶稣诞生。虽然同为对诗中耶稣进行处境化的调适，不过这一次诗人祈求耶稣的诞生，为的不是“中华”这个国家全体，而是“中华教会”。例如，诗人回顾历史，认为耶稣常与百姓“同受苦”，更是站在“弱小”者与“落难”者一边，由此作者祈求耶稣降临，“用慈爱的怀

^{①②} 吴破我：“庆祝耶稣降生在中华”，载《天风》，总第102期，1947年12月，第11页。

抱,光照我中华教会”。在诗的第三节,作者更是祈求基督徒能够“不受国家主义的限制”、“不作资本主义的拥护”以及“不供任何主义的驱策”,并且引用《孟子·滕文公下》的著名片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见“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潮,在诗人看来,已经充斥于整个社会中,甚至已然渗入教会。故置身于内战中的中华教会,需要耶稣的诞生以“搭救”之。^①

在诗的最后一节,诗人化用《启示录》22:13中耶稣是“阿拉法”与“俄梅戛”的形象,以及教会传统视为预表耶稣的一些《旧约》典故,结合福音书中耶稣诞生于马槽与十字架受死的文本,再一次以“中华教会”代祷者的身份,向耶稣发出呼求:

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啊! /你是阿拉法, /你是俄梅戛, /你在火烧不尽的荆棘中, /你在烈焰挑旺的火窑中, /你在涓滴清流的溪水旁, /你在穷苦不堪的寡妇家, /你在非人生活的马槽里, /你在惨无人道的十字架上, /你老是同患难, /我愿学像你。 /我整个中华教会, /数十万信男信女都要效法你, /“驱我何往, /我愿前往, ” /火中有你是乐园, /水中有你是天堂。 /亲爱的主啊! /愿从今年起, 求 /你降临, 用五旬节的灵火, 锻炼我 /中华教会。^②

结 语

民国时期基督徒关于耶稣形象的诗歌,除了前文所讨论的圣诞诗,还有不少涉及耶稣生平(例如耶稣呼召门徒、使拉撒路

^{①②} 吴破我:“愿耶稣生在我们当中”,载《天风》,第7卷第2期(总154号),1949年1月,第11页。

复活、预言末日、洁净圣殿、为门徒洗脚等），^①以及耶稣的受难和

- ① 关于耶稣呼召门徒，例如：“得人如鱼，耶稣首言应。请看四门徒，都有打鱼兴。耶稣初出召门徒，便在海边信口呼。而彼四人噉然应。无或犹疑在半途。虽然由主有神力，亦由四人性坚切。遂各弃网并弃船。不恋其亲遑职业。吾人信主今如何，若鱼在水游江湖。主虽大声呼不应，念念只自便私图。”参见严霁青：“二约人物诗（耶稣召彼得安得烈雅各约翰四门徒）”，载《真光杂志》，第36卷第5期，1937年，第57页。又如：“他走到海边，对那撒网捕鱼的人说：收了你们的渔网，不要捉水中的鱼虾 / 跟我来——去把自己的兄弟网起，/ 从那汹涌涛涛的苦海。 / 他走到那田园，对那种田的人说：放下你们的犁耙，/ 丢开那袋里的麦种。跟我来——去垦犁那生满荆棘的人类灵魂的荒地，把福音的种子播种在他们空虚的心田。 / 他也向那青翠的山林招手， / 呼唤那吹着号角的牧人：亲爱的牧羊人，撒放开你主人的羊群， / 让它们自由地去吃草。 / 跟我来—— / 用你的美好的角笛。 / 吹响‘天国的福音’ / 集合那迷失了路途的人们。 / 连那收税人都没丢弃， / 他用那怜悯的语言对他说： / ‘你是有‘罪’的人！ / 为着‘法利赛’人的贪欲 / 你向着人民的仓库搜索。 / 快丢开你罪恶的钱袋， / 跟我来—— / 去收那些财主们的租税， / 因为他们的财富， / 都是用黑的心欺骗而来。”参见麦青：“基督耶稣”，载《诗创作》，第17期，1942年，第18—19页。

关于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例如：“此固主奇异，亦由信相孚。假令无信德，主亦常人如……假令无信德，肉骨且就枯……而赖女徒信，生存使复初……何如彼二女为弟求援扶。”参见严霁青：“耶稣复活拉撒路”，载《真光杂志》，第38卷第10期，1939年，第50页。

关于耶稣预言末日，例如：“末日将近，飞灾横祸多。难期人减少，降世可如何。独有门徒在，寻常受琢磨……主恩诚浩大，今古沐恩波。现值烽烟警，围城尽楚歌。竭诚常祷告，灵验胜弥陀。”参见严霁青：“二约人物诗（耶稣为选民要减少灾难的日子）”，载《真光杂志》，第37卷第12期，1938年，第58—59页。

关于耶稣洁净圣殿，例如：“不容垄断作生涯，圣殿原为我父家。太息贪狼终古恨，只今盘据待鞭撻。”参见严霁青：“耶稣奇迹二十首”，载《真光杂志》，第25卷第12期，1926年，第72页。又如：“忙了整整六天，今日又奉安息。纯良朴朴素素的，带着颗赤诚的心，进了事神的圣殿。刚刚踏进门内，忽地气怒冲天！清洁的圣殿里，充满了拿耶稣当幌子的，牟利群丑在胡说八念！猛抬头，望见了耶稣清殿的圣鞭。不由分说的绰鞭在手，其势汹汹的乱击打了一番！毒蛇的种类赶快滚开，要不然，你们的狗命是难逃这义怒的圣鞭。群丑奔避了，盛怒复转平淡；然而我的心呐，你也是神的圣殿；若不保持圣洁，鞭责也恐难免。”参见海鸥：“耶稣的鞭子”，载《真光杂志》，第29卷第6期，1930年，第88页。

关于耶稣为门徒洗脚，例如：“亲行濯足示谦光，提命谆谆黯自伤。幸喜我徒能继述，一宗万派教无疆。”参见清民：“读耶稣传杂咏”，载《善导报》，第34期，1915年，第382页。

复活。^①本文尤其尝试为那时的“诗中耶稣”研究开辟出新的空间。既有的研究多关注民国时期几位重要知识分子以耶稣为主题的诗歌,例如徐志摩的《卡尔佛里》、艾青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朱雯的《逾越节》,以及冰心的《客西马尼园》与《髑

① 关于耶稣受难与复活,例如:“百般侮辱百般形,惨酷尤为三铁钉。临死七言犹在耳,争教人不泪长零。/下降为开灵薄门,好携古圣沐新恩。未几三日生如故,已肇人人复活根。”参见清民:“读耶稣传杂咏”,载《善导报》,第34期,1915年,第383页。

又如:“葡萄汁染汲沦溪(约翰十八章一节),血汗名园记客西(马太廿六章三十六节)。身献祭坛同圣犊,愿将慈翼覆雏鸡(马太廿三章三十七节)。天衣无缝七襄报告,王号有三三国齐(约翰十九章十九至廿三节)。甘作牺牲为救主,仰瞻苦架共悲啼。”参见仲伟仪:“耶稣受难纪念日感怀诗并序”,载《青年进步》,第121期,1929年,第81页。

又如:“看啊!那一滴滴的血流着! /看啊,那一粒粒的汗…… /美丽的爱心在为卑污的人们祈求, /主,你爱的人们离开了你, /听,那队队队的鞭声, /听,那无止声…… /茨冠! 茨冠! 预备你戴的么? /谦逊的蒙了侮辱,那敝袍, /我要想想…… /主,还是无人接受你爱人的心! /看,那边天暗了,悲惨的黑暗! /听,地震声,山裂声…… /温美的羔羊,被钉,我哭你…… /人真是忍心!”参见鲁光:“耶稣苦难”,载《磐石杂志》,第4卷第4期,1936年,第300页。

又如:“纒度韶华三十三,平生历尽是心酸。令人不忍睹其苦,为众捐躯乃自甘。閻世何人辨真假,无情十架有情身。开天途径通神处,从此大千不再沉。”参见林凤轩:“耶稣受难”,载《真光杂志》,第36卷第5期,1937年,第58页。

又如:“没有青草鲜花的不毛山上,呼啸着的狂风加紧急吼……强盗惯睡的黄土地,蟋蟀声很少听见的;午前来了一只可爱的流血羔羊,狂风发出哀音。但是他的宝血洗净了你我的罪,他代替我们献上他自己。髑髅地上的风平静了,髑髅地上的耶稣救恩无穷止。”参见蓬心:“髑髅地上的耶稣(散文诗)”,载《会幕报》,第8期,1940年,第12页。

又如:“乱时遇大难,敌机头上鸣。移时机过去,莫不庆再生。又坐炮火里,霎时几震惊。俄焉炮火息,便各祝太平……而今基督替人死,三日复活现真形。世人因彼皆复活,得不再受原罪刑。较之世间须臾难,渡过何足未忘情。”参见严霁青:“又咏耶稣复活”,载《真光杂志》,第39卷第3期,1940年,第57页。

又如:“精神不死垂千古,道义长存贯众生。”参见谢安之:“耶稣受难(七律)”,载《希望月刊》,第16卷第3期,1944年,第4页。

骸地》。^①但是民国报章杂志上还有丰富的基督徒诗歌创作，却几乎未有学者提及。愿今后有更多学者对这些作品展开研究，从多元视角探索“耶稣、诗人与诗”这一民国时期基督教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

作者王志希，福建省福州人，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博士候选人，神学研究文学硕士，基督教研究文学硕士，厦门大学法学硕士，法学本科。研究方向为中国基督教与圣经接受史。

（执行编辑 邱业祥）

① 例见 Maria n Gálik, *Influence, Translation and Parallels: Selected Studies on the Bible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2004, 287—297; 洪玲：“肩负起民族和人类的十字架——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耶稣形象”（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祝宇红：“‘本色化’耶稣——谈中国现代重写圣经故事及耶稣形象的重塑”，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